



北京大学

# 本科生毕业论文

撒切尔夫人下野探源  
——基于“疑欧”与“亲欧”之争的分析

**The Eclipse of Margaret Thatcher:  
A Study on the Clash between Eurosceptics and Europhiles**

姓 名： 宋仪萱

学 号： 1700014555


院 系： 国际关系学院

专 业： 国际政治

指导教师： 梅然

二〇二一年六月

##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

论文题目 (中文)	撒切尔夫人下野探源——基于“疑欧”与“亲欧”之争的分析				
论文题目 (英文)	The Eclipse of Margaret Thatcher: A Study on the Clash between Eurosceptics and Europhiles				
导师姓名	梅然	职 称	副教	论文成绩 (百分制)	95
导师评语 (包含对论文的性质、难度、分量、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等评价)	<p>1989 至 1990 年，保守党内部两次有议员发起了对撒切尔夫人的党魁地位的“挑战”，第二次挑战导致了其下野。这两次挑战得以出现并最终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本论文以此作为核心问题。论文强调“欧洲因素”，或者说保守党内的“亲欧”与“疑欧”之争，是导致撒切尔夫人遭遇挑战并下野的首要宏观因素。认为欧洲因素相比经济等其他宏观因素更具解释力，是本文的主要观点所在，也有学术创新意义。论文参考和引用了能较好涵盖相关研究的不少著述，逻辑比较清晰、文字通顺，格式工整，结构合理。作者对论文的写作从始至终也是积极主动，定题、列提纲到成稿都很早，且多有修改。因此，是一篇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 margin-top: 20px;">导师签名: </p>			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发的欧洲因素更吸引眼球，迷惑性也更强。因此，梅杰的判断是部分正确的：如果投票税单独出现，它不会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。<sup>1</sup>如前文所述，它处在两次挑战的中间，第二次挑战前已被基本解决，只残留一种恐惧或动荡的“感觉”；而正因为此时欧洲因素也骤然激化，投票税才会被误认为造成了影响，成为了需要被排除的因素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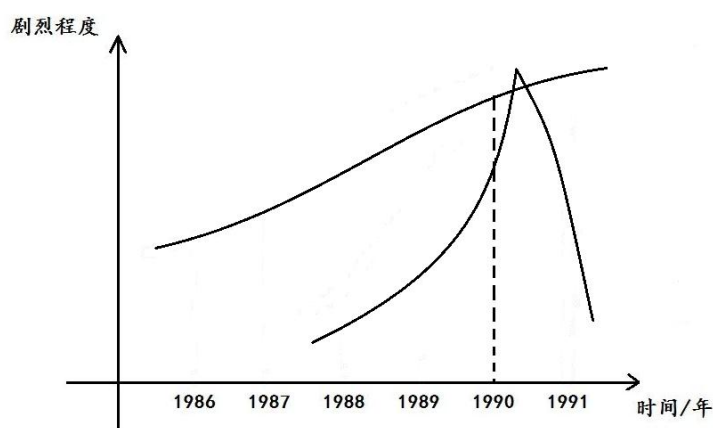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：内政因素和欧洲因素演变示意图

注：虽然时间短暂，但内政因素毕竟引发了暴力事件，而欧洲因素没有，因此本文认为内政因素在最高点时应比欧洲因素更激烈。

资料来源：自制

#### （四）小结

本章用两节的篇幅，论证了经济问题上的分裂不足以激发挑战，而内政因素则是被误读的突发事件，同样不能为挑战负责。因此，欧洲因素便从庞杂的事实、散乱的论述中被剥离出来，成为了对挑战负责的唯一宏观因素；或者说，相比于公认的其他因素，欧洲因素的作用远超其他原因，以至于其他因素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。同时，比较的过程也足以证明，欧洲因素自有其逻辑，完全不是“一个女人的偏见”这么简单。

然而，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解释：按本章所言，欧洲因素并非突然出现，而是积累已久，那么为什么至1989年才有挑战发生？此外，挑战一年一度按期举行，因此，两次挑战可以说是连续发生的，然而两次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这是为什么？具体而言，为什么第一次挑战会失败？为什么第二次挑战虽未能在投票中击败撒切尔，但最终成功更换了首相？本文接下来的章节，就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，将原因和结果一以贯之，增强欧洲因素的解释力。

<sup>1</sup> John Major, *John Major: The Autobiography*, p167.

## 二、“抱怨不断的旅程”？<sup>1</sup>——欧洲因素与第一次挑战

前文论证了对欧态度分歧是引发挑战的原因：遗留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挑战出现于1989年？又为什么两次挑战原因相同，结果不同？本章就将系统性展示欧洲因素的积累发展，解释欧洲因素何以激发第一次挑战，并决定其结果。如前文所述，欧洲问题虽然是保守党的老问题，但却在相当长时间内不甚明显；而作为共同体的欧洲，也是在很晚近才出现。因此，作为撒切尔下野的研究，本文将1980年代中期作为起点，避免追溯过远。

### （一）起点：单一欧洲法案（Single Europe Act）通过（1986年）

在第一任期内，撒切尔主要关注的是预算问题，她强硬施压法德、“要回我们的钱”等等表现，推动了相关议题的协商，欧洲各国终于在1984年解决了预算分摊问题；撒切尔虽然当时仍不满意，但也最终接受，双方达成一致，前期的英欧冲突至此暂告段落。<sup>2</sup>然而撒切尔夫人却并不满足于此，她决心推动新的议程。

#### 1. 理想的动机：经济改革

简而言之，撒切尔夫人想要让欧共体彻底摆脱保护主义（protectionism），成为真正的共同市场，完全普及自由市场经济。这当然是撒切尔对内政策的延续，同时，它也是当下的总体潮流——七十年代的经济衰退，促使欧洲国家同样转向自由经济。因此，打破关税壁垒、破除不合理限制、推动人员资本流动等等诉求，被冠以“公平竞争环境”（level playing-field）的名号，成为了欧共体其他主要国家的目标。<sup>3</sup>以此观之，双方在经济自由层面至少是契合的。这推动了撒切尔的议程，使得所谓“单一市场”谈判能够迅速开展。

为了确保理事会（the European Council）能够通过单一市场的决定，撒切尔和时任财相杰弗里·豪决定打破常规，通过一份“君子协定”，确保和单一市场有关的议程不必全体通过，只需加权投票通过即可。同时，其它议程继续保留全体一致原则。<sup>4</sup>在1985年6月召开的米兰会议上，撒切尔对发生的意外做出了妥协，并在之后的半年时间中多次让步，目的都是促使单一市场法案尽快通过。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，1986年2月底，“单一欧洲法案”正式签署，同年4月，法案在下院通过，确认1992年前完全建立欧洲的共同市场。杨在总结评价认为，该法案中英国得益最多，远超其他国家。<sup>5</sup>

<sup>1</sup> John Major, *John Major: The Autobiography*, pp. 174-175. 原文意为：首相无疑登上了“欧洲列车”，尽管她对行驶的方向感到不安，并在每一站都大声抱怨。采用这一比喻，其一是它能较好地这一时期英国和欧洲一体化的关系，尽管只停留在表象；其二，它反映出此时亲欧、疑欧两派处于争斗状态；其三，实际上并非抱怨不断，而是另有其因，后文会提及，因此结尾使用问号，表示存疑。

<sup>2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p. 324-325.

<sup>3</sup> *Ibid.*, p326.

<sup>4</sup> *Ibid.*, p330.

<sup>5</sup> *Ibid.*, p334.

## 2. 低调的质疑：分歧伏笔

然而问题在于，既然撒切尔多次让步，为何最终得益最多？毫无疑问，得到的利益是经济层面的，但出让的却是政治利益，该法案的下院正式名称《欧共同体法案修正案（European Communities (Amendment) Bill）》便揭示了这一点。显然，这是一项涉及面广、具有结构意义的法案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其主要起草者，却是撒切尔派往欧共同体委员会（the European Commission）的英国代表。这位代表似乎曲解了首相的本意，“忽视了更大的政治问题”，试图将宪法性权力、国民情感、增进自由等事项也加入其中。<sup>1</sup>这完全偏向了另一种意见，即要想真正打破壁垒，那么必须将“非关税壁垒”（non-tariff barriers）也打破，将国家权力汇集到欧共同体手中，实现政治上、社会上的一体化，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委员会主席德洛尔（President Delors），而该法案也被看作“德洛尔计划第一阶段”的前期铺垫。

作为日后疑欧派的领袖，撒切尔夫人显然反对政治、社会一体化，那么她此时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？据她自己回忆，其一，社会领域和文化价值统一，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愿望，只是代表了各方对一个“联盟”的幻想，因此难以拒绝；其二，她赞同政治上的合作，但认为这是福克兰战争（the Falklands War）的经验，并不意味着创制机制、攫夺主权。<sup>2</sup>更关键的是，她清楚加权投票制是一种妥协，同时也确保了社会领域英国的保留执行权。<sup>3</sup>简言之，撒切尔对政治合作的理解与其他国家不同，同时认为社会领域合作只是空话、宣言，没有意义。如果她的一家之言不够客观，那么其他研究可以作为旁证：沃特金斯也采信该说法，<sup>4</sup>还有学者关注到了语言表达的差异，<sup>5</sup>更有学者直接评价撒切尔此时过于天真，没能理解对方的深层含义。<sup>6</sup>杨的观点则不同，他认为撒切尔十分了解该法案，自信能够控制局面，只是后来失控。<sup>7</sup>尽管侧重不同，但至少最后结果是肯定的，那便是包括撒切尔在内的疑欧派，当时并未提出高调的反对，欧洲因素并未造成明显影响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是“事后诸葛亮”，在批准法案时，议会保守党中便已出现低调的反对声，特别是反对欧洲法院职权、欧洲议会改名（从 Assembly 改为 Parliament）等政治进程。<sup>8</sup>虽然这些疑欧派没有公开反对政府，但相关意见的确产生了影响，撒切尔后来也对此时便提出警告的议员表示赞许。<sup>9</sup>这证明，关于委员会权力扩大的问题，在当时的确引发了讨论，只是规模上并不引人注目。结论是，欧洲因素就此萌生，但随即又归于平静。

<sup>1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547.

<sup>2</sup> Ibid., p550, p548.

<sup>3</sup> Ibid., p555, p553.

<sup>4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15.

<sup>5</sup> N. J. Crowson, *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: At the Heart of Europe?* p52. 值得一提的是，该著作对单一欧洲法案的节点意义评价与本文基本相同，也认为这标志着分歧的开始。

<sup>6</sup> Eric J. Evans, *Thatcher and Thatcherism*, p88.

<sup>7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p. 336-337.

<sup>8</sup> Ibid., p335.

<sup>9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556.

## （二）累积：两条线索（1986-1989年）

议会保守党虽然出现分歧，但影响很小，加之一段时间内欧共体决策相对平稳，因此这种分歧并不引人注目。但是，当它再次显现时，境况则大为不同——内阁因为欧洲出现了意见对立。众所周知，内阁是政府的核心，人数少、资历高、影响力强，而议会保守党人数众多，其中更不乏资历浅、话语权小的后座议员，显然二者不可等量齐观。因此，当欧洲问题蔓延至内阁时，它的积累速度明显加快，造成的后果无疑也更加严重。

### 1. 节点一：1987 撒切尔与罗森的 ERM 分歧

前文曾述及，ERM 是汇率机制，它是欧洲货币体系（European Monetary System）的一部分，旨在保持稳定的汇率，成员国的汇率未经协商一致不得变动。<sup>1</sup>事实上，1985 年便发生过一次争论，罗森那时便要求加入该机制，但正如第一章所述，作为一个经济问题，撒切尔的处理方式和罗森不甚相同，因此此事未能成行。然而罗森做出了大胆的举动，未经批准仍然实质上执行该决定。这意味着，英国虽然没有加入 ERM，但相关政策却完全按照加入的情况制定（“shadow the Deutschmark”），除了缺乏文字上的程序，事实层面几乎分毫不差；同时，撒切尔对此并不知情，她仍以为政策是根据英国实际而制定的。

然而隐瞒并没有持续很久。1987 年 11 月，撒切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，为什么要采取这些财政措施，撒切尔此时才意识到财相正在做什么。12 月初，她在内阁会议上抛出了这一问题，认为这种干预措施会导致通胀等严重后果；罗森却认为干预被“中和”了（sterilized），并不会引起通胀。<sup>2</sup>然而事实是通胀率的确开始增长。自此，双方开始互相推卸责任，争论焦点也变为是否相信欧洲机制，具体手段则完全成为其分支问题。

之所以下此结论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：作为经济议题，撒切尔夫人并非完全反对固定汇率，但她更希望保持政治上的灵活性。<sup>3</sup>至于货币问题，她采纳了另一套方案，即由英国控制的 hard ecu（European Currency Unit）计划，<sup>4</sup>两者的不同自然在于主权、政府间合作等政治领域。撒切尔曾通过这一疑欧式方案，试图抗衡德洛尔计划，建立政府合作式货币联盟。<sup>5</sup>

概言之，选取 ERM 分歧作为节点，原因在于：它见证了经济问题转向从属，而欧洲问题迅速崛起的过程；它也是欧洲问题成为一个问题、正式进入内阁的界标。撒切尔回忆说，自该事件之后，她与罗森的关系越来越差，双方也仅维持表面的团结，<sup>6</sup>实际上则为了 ERM 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各说各话。至此，欧洲因素自 1986 年于议会保守党萌生、又归于平静后，在 1987 年底于内阁重新浮现，并开始了两条线索上的同时积累。

<sup>1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341.

<sup>2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p. 701-702.

<sup>3</sup> Ibid., p701.

<sup>4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341.

<sup>5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750.

<sup>6</sup> Ibid., pp. 702-704, pp. 741-742.

## 2. 节点二：1988 布鲁日演说和 1989 欧洲议会选举

1987 年末至 1988 年初分歧显现之后，撒切尔和罗森仍然维持着合作，正如撒切尔自己回忆说，在 ERM 的问题上他们尖锐对立，然而在更广泛的“经济与货币联盟”（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，以下简称 EMU）问题上，他们却高度一致，双方都厌恶这种明显剥夺主权的行为。<sup>1</sup>因此，在 1988 年之后一段时间，内阁整体上维持着平稳。

然而 EMU 却得到了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极力推荐，根据他们的方案，不仅欧洲中央银行指日可待，委员会也会变成无所不包的机构，涉足各个领域，且权责严重不相称。撒切尔对此感到沮丧和愤怒。<sup>2</sup>她认为必须有所反击，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选择，为欧洲指明真正的光明道路，这便是布鲁日演讲，即 1988 年 9 月在欧洲学院的演讲。由于这次演讲十分知名，本文不再赘述其内容，但它对议会保守党的影响却不可不提。撒切尔认为演讲十分成功，得到了议会乃至全国的欢迎；<sup>3</sup>议会保守党也的确做出了反应，成立了“布鲁日研究小组”（the Bruges Group），表达对撒切尔及其欧洲观点的赞同。<sup>4</sup>

这证明了布鲁日演讲的节点意义：议会保守党至此开始出现选边站队现象，疑欧、亲欧两个对立阵营出现；议员应归属其中一个，也成为显著的趋势。诚然，这种分野可能仍不甚清晰、发生改变，但是至少派别区分已经出现，并朝着稳固的方向发展。相应的是，从前的小派别也走向整合、合并，如有学者指出，布鲁日演讲让原则上的疑欧派与机会主义疑欧派联合，最终成为一派，共同反对欧洲的政治社会一体化。<sup>5</sup>与此同时，不愿加入疑欧阵营的议员自然成为了亲欧一派，他们震惊或诧异于撒切尔的立场，更不能理解从“单一欧洲法案”到布鲁日演讲的转变，<sup>6</sup>自然要与疑欧派保持距离。

如果说演讲后仍存中间地带，那么在 1989 年夏欧洲议会选举后，该地带则迅速缩小。保守党的失利，使得以希思为代表的党内元老公开谴责撒切尔。<sup>7</sup>他们固然不再属于内阁，但一定代表了不少议会议员。由此观之，议员已经有了这一认识：再不选边站队、施压首相，会危害自己的选举。但撒切尔认为，参选者并非都是“布鲁日派”（Brugesist），批评有失公允，还损害了党的形象。<sup>8</sup>这无疑代表了对立意见。因此说，议会保守党的分野基本完成。

<sup>1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p. 707-708.

<sup>2</sup> Ibid., p743.

<sup>3</sup> Ibid., p746.

<sup>4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18.

<sup>5</sup> Anthony Forster, *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: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*, p78.

<sup>6</sup> 亲欧派议员当时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记述，但 Young 记录杰弗里·豪的观点说，撒切尔认同了签署单一欧洲法案时她自己决不会认同的观点，从中可窥见议会保守党的态度，参见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350. 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，撒切尔通过布鲁日演讲变相承认了 1986 年自己的错误，但这一态度显然未能被亲欧派察觉，参见 N. J. Crowson, *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: At the Heart of Europe?* p53.

<sup>7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p. 118-119.

<sup>8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749.

### 3. 节点三：1989 马德里峰会

同样是在 1989 年的夏天，内阁也终于因为欧洲问题走向对立。在 6 月的马德里欧洲理事会议前夕，内阁两位重臣：外相杰弗里·豪和财相奈杰尔·罗森，联合向撒切尔施压，要求她在马德里峰会上明确表态，支持加入 ERM，同时为加入设定具体时间限制；如果不这样做，两人就都将辞去现任职务。<sup>1</sup>考虑到其时间的紧迫性、发生的突然性，用“政变”来形容这次行动并不为过，而首相也不得不在震惊中屈服，在峰会中宣布支持德洛尔计划第一阶段，同时承诺加入 ERM。<sup>2</sup>亲欧派用自我暴露的方式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。<sup>3</sup>

撒切尔认为该峰会应该讨论 EMU，以及欧洲应不应该有社会宪章（Social Charter），毫无疑问她在这一问题上失败了，还无奈地部分认可了德洛尔计划。然而她也取得了成绩，其一是强调该计划不是唯一规划、不能有自动推进程序、不应该成为召开其他会议的原因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合作停留于经济层面；其二是和法国各自发表宣言，这保证了外交的灵活性。<sup>4</sup>简言之，疑欧的议程也在继续推进，并没有因会前“政变”而转变。

就本文的观察角度而言，马德里峰会意味着内阁的对立正式形成，亲欧和疑欧两派明显分野。撒切尔夫人认为，此时的内阁整体左倾，豪作为政变的主要负责人，无疑是“左”的代表。<sup>5</sup>因此她对内阁做出调整，任命梅杰取代豪成为外相，而豪担任下议院议长，同时给予副首相（Deputy Prime Minister）的荣誉头衔。这一过程证明，此时内阁固然已出现派系分野和对立，但矛盾并非十分激烈，甚至派系本身仍有调整的可能。理由是，其一，豪最终接受了这一职位，并利用其影响力继续推动亲欧议程，而非直接决裂；<sup>6</sup>其二，“从犯”罗森并没有受惩罚，继续担任财相，这可能因为他并非主谋，更可能与他的 EMU 观点有关（如前文）。因此，此时内阁中的矛盾并不十分激烈，而是仍停留于“存在”的层面。

### 4. 节点四：1989 罗森辞职及其余波

然而正如本节开头所言，内阁的矛盾积累演化，要远快于议会保守党。当年十月，财相罗森向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辞职的请求。杨代表的学界观点认为，辞职是因为撒切尔偏听自己的私人顾问，而不理会财相本人的意见；<sup>7</sup>撒切尔认为，问题在于自 1987 年底以来，双方的不信任积重难返，才导致辞职。<sup>8</sup>本文认为，他们都部分正确，但却没有论及要点。本文的观点是，罗森意识到撒切尔不会再改变态度，特别是改变对 ERM 的怀疑，因此自己再多努力都不再有意义，更不可能通过自己希望的手段，控制通胀率并给经济降温。而正如前文所

<sup>1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354.

<sup>2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20.

<sup>3</sup> Tim Bale, *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: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*, p288.

<sup>4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750, p752.

<sup>5</sup> Ibid., p756, p758.

<sup>6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363.

<sup>7</sup> Ibid., p356.

<sup>8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714.

述，罗森偏爱的手段，正是欧洲机制和汇率。因此，根本上讲，是对欧态度分歧坚定了罗森的决心，<sup>1</sup>这也回扣了前文“经济问题越发居于从属地位”的论断。

罗森辞职还引发了一系列后果，其一是豪公开赞赏了罗森，特别是在欧洲问题上的坚持，这毫无疑问是亲欧派的反抗；<sup>2</sup>其二则是撒切尔夫人任命梅杰兼任财相，将外相、财相两大职位全部委托给梅杰。这意味着内阁不仅因欧洲问题分为两派，首相及其内阁更为这种分野付出了代价。这样说的原因在于：其一，短时间内连损两位关键阁员，比只调离一位阁员要严重得多，内阁的稳定性遭受重创，首相及其政府的执政能力无疑会受到质疑。其二，作为党魁，撒切尔的个人权威受到打击。她在任命亲欧派时变得极端小心，即便委派也要确保关键部门在掌控之中，否则宁可一人兼二职。<sup>3</sup>同时，亲欧派代言人杰弗里·豪虽失去实权，但仍高调推进亲欧议程，这或多或少证明内阁其他部门中不乏支持者，甚至是坚定的支持者。这表明，党魁的欧洲观已经无法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，反倒是招来批评。而考虑到内阁成分、议员升迁等等问题，她又不得不提拔部分亲欧派。<sup>4</sup>这无疑都是她自己付出的代价。

至此，1989年挑战之前的欧洲因素演变告一段落。从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通过开始，欧洲因素经由议会保守党、内阁两条线索，不断积累演化，最终在议会保守党中造成了派系分野，而在内阁中更进一步，整体为这一分歧付出了代价（见表2）。

表 2：欧洲因素的演变和积累

欧洲问题的演变和积累			
时间	事件	层级	节点
1986	《单一欧洲法案》通过	议会保守党	分歧出现
1987	ERM 之争	内阁	
1988-89	布鲁日演说、欧洲议会选举	议会保守党	分歧导致派系分野
1989	马德里峰会	内阁	
1989	罗森辞职	内阁	为分歧付出代价

资料来源：自制。

应说明的是，突出节点并不意味着欧洲因素是跳跃式演进，只是出于方便观察的目的才有所详略。同时，两条线索也并非绝对平行，如布鲁日演讲在内阁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最后，亲欧、疑欧有利益考量，但更是观念差异，认为疑欧派只是“抱怨不断”是不合理的。

<sup>1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22. 该文论断与本文相同。

<sup>2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718.

<sup>3</sup> 应说明的是，梅杰的兼职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后来撒切尔任命赫德接任外相。赫德并非疑欧派，但也谈不上是典型的亲欧派，他更多是一位专业官僚，执行上司的命令，因此任命他做外相是可控的，参见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25。而他在1990年挑战时表现的忠心、在梅杰首胜后立刻退出，都证明其政治野心较小，可印证上述判断。

<sup>4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754, p758.



### （三）预兆：第一次挑战及其失败（1989年）

行文至此，不妨先回顾第一章末尾提出的问题：欧洲因素也并非从天而降，而是早有积累；即便按本章划分，1986年之后欧洲因素也已出现，那么为何直到1989年才引发挑战？

本文认为，是否导致挑战，取决于欧洲问题是否在全党造成了派系分野：是，则一年一度的挑战会被发起；否，则这样的挑战不会发生。显然，这一判断标准是一个“是或否”的问题。证据是，其一，事实成立。根据前文，至1989年，议会保守党和内阁存在分野已成事实，换言之，全党此时皆可依据欧洲立场一分为二。所谓的“派系分野”真实存在。其二，逻辑推断。欧洲因素长期积累，然而1987、1988年均未出现挑战，1989年才出现挑战，因此一定是1989年出现了新的状况，而1989年出现的新情况正是派系分野。同时，根据某一个具体问题能将全党划为两派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；经济问题也许可以，但它已有大选作为裁定。就其他议题而言，众所周知，很多后座议员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抱看法，只是服从内阁政府命令而已。而欧洲因素此时便特殊在，它已真切威胁到普通议员的当选问题，或者说至少议员们认为它威胁到了，因此不得不选边站队、参与其中，其它问题上的合作只能搁置一边，优先解决最基本的当选问题。其三，符合常情常理。第一章曾述及，欧洲问题作为新问题，缺乏现有解决方法，紧迫性又相对较强，因此当两个鲜明的对立派别出现、又似乎造成了一些令人恐慌的结果时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便已出现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已具备。一言以蔽之，欧洲因素是挑战原因，宽泛地讲是正确的，而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，它具体在何种情况导致挑战，则需要由“派系分野”这一可衡量的值来解释。

然而该解释并不能包含其它细节，如，为何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发起挑战？内阁成员为何没有及时调节、事先化解挑战？后一个问题相对好回答一些，此时内阁显然也已经分为两派，甚至还为分野付出了代价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。因此，“亲欧”的内阁成员没有动机阻止挑战，反倒有可能乐见其成，借此机会警示首相，让她意识到党内不满，及时改变政策；“疑欧”的内阁成员则没有能力阻止挑战，因为发起挑战的一定是“亲欧”派，他们为什么要采纳对立派系的意见？显然是没有理由的。

而第一个问题也与“派系对立”有关。是否存在派系分野，如前文所述是一个“是或否”的问题，但它却不能刻画对立本身的激烈程度，自然也不能刻画“亲欧”派颠覆撒切尔夫人的紧迫性。事实是，“亲欧”一方只有一位梅耶议员发起挑战，本身就证明了本方能力或动机的不足；换言之，“亲欧”一方要么没有能力推出一位有力的代言人，要么根本就没有在意当年的挑战、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这证明，此时虽然已有对立，但并不严峻。其原因也很好解释，其一是罗森辞职让内阁、撒切尔本人都付出了代价，众人期待首相能有所改观，因此没有必要急于挑战，也不至于跃出内阁框架解决问题；其二是杰弗里·豪依然宣传着自己

的观念，内阁中也不乏“亲欧”人士，这至少在内阁层面给予了希望，即问题仍能通过普通内阁议事方式和平解决。因此，如果说“亲欧”阁员没有动机阻拦挑战，那么他们挑唆挑战、甚至亲自发起挑战的动机也不充足。<sup>1</sup>

综上所述，1989年才发生挑战的原因，是此时全党都已因欧洲因素完成分野，两大对立阵营出现。而1989年挑战分量不足、影响力不大的原因，在于内阁和首相已经因为对立付出了代价，挑战方意愿不足，重视度不高。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终结果：梅耶先生大家根本没有耳闻，显然所获票数少之又少，他们应是最坚定的“亲欧”派；“疑欧”派、期待首相付出代价后有所改变的“亲欧”派，自然投给撒切尔夫人。最终投票结果<sup>2</sup>证明，本文假设基本合理，大多数人仍支持撒切尔，期待不高的、或说顽固的“亲欧”派相对较少，首相因此得以在第一轮内结束游戏，继续担任党魁。

应补充的是，本文强调宏观研究，但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完全失灵，欧洲因素的程度只能主导大致的意向，而具体结果，如几人投票给挑战者、几人属于高期待的“亲欧”派、挑战于第几轮结束等等，可能仍要求助于其他因素，而不是一句决定论式的论断可以回答的。

---

<sup>1</sup> 这一推断是符合事实的，当时鲜见梅耶的辩护者，更没有公开的内部支持，参见 Philip Norton, “Choosing A Leader: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-1990,” p254.

<sup>2</sup> 绪论中曾提及具体票数，重复如下：撒切尔 314 票，梅耶 33 票，弃权 3 票，无效票数 24 票。

### 三、“从未败阵的首相”？<sup>1</sup>——欧洲因素与第二次挑战

如前文所述，在对欧态度分歧积累已久之后，第一次对党魁的挑战接踵而来；而并不十分激烈的对立，使得第一次挑战最终失败。遗留的问题是，既然已经失败，为何 1990 年挑战仍然发生？而第二次挑战为何最终成功？本章就将关注欧洲因素的最后的演变，及第二次挑战的发生和成功，回答上章末尾的问题，并对最终结果进行探讨。

#### （一）激化：未成功的调和（1990 年）

1989 年亲欧派发起的挑战以失败告终，这证明在民主程序下，他们没能得到认可。那么又出于何种原因，亲欧派在一年后接续发起挑战？按照上文思路，是否有挑战发生的判断标准，是是否存在派系对立。因此很显然，1989 年挑战后，并没有出现缓和的进程，全党没能退回到派系之前，两派对立得以保留，发起挑战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，所以挑战如期而至。此处的疑问是，既然已遭到挑战，“预兆”已经出现，首相为什么不回应党内呼声，想办法至少化解某一层面的派系对峙；反倒是容许其继续存在，保存了下一次挑战的条件？本节就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。

事实上，撒切尔当然意识到了亲欧派的不满，据她自己回忆，她增加了与后座议员的沟通次数，并和很多人进行了坦诚的对话。<sup>2</sup>虽然有学者怀疑这些交流的效果，<sup>3</sup>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撒切尔的确在做出尝试。然而这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，即在真实的政策上做出让步。1990 年 7 月，她拒绝了梅杰的提议，认为还不能加入 ERM。她认为，只有在利率手段对通胀起作用之后，才能带着自信和实力加入。这一时机终于在当年 10 月到来，其政府也终于在 10 月初宣布加入 ERM。<sup>4</sup>这可以算作撒切尔对亲欧派的实质性妥协。

然而这一妥协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。其原因有二。首先是 ERM 的象征意义不比从前，欧洲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，单一货币的追求已经出现。因此，亲欧派的成员更看重 EMU 的进程，以及最终统一货币的实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甚至是亲欧派对撒切尔做出了妥协，他们通过 hard ecu（见前文）计划，使撒切尔相信加入 ERM 并不必然导致货币一体化，而是有自己的替代方案。<sup>5</sup>撒切尔进而终于做出许可，同意加入该机制。

<sup>1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208. 该形容指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大选从未败绩，在党内挑战中从未落败，即便是 1990 年也是高票领先、最终自己退出。采用这一形容，其一是揭示本章的主要内容，即探究最终结果；其二是突出问题所在，即“从未败阵”却仍然失败，并提供理论化的解释；其三，本文的解释认为“从未败阵”在宏观上是无意义的，因此使用问号结尾表示不甚赞同。

<sup>2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830.

<sup>3</sup> Tim Bale, *The Conservative Party: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*, p24.

<sup>4</sup>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p. 723-724.

<sup>5</sup> 参见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p. 132-133. 以及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p. 364-365.

原因之二则是，撒切尔在妥协后，仍继续大力推进疑欧的进程，并迅速超过了之前妥协的程度，使安抚不再有意义。其代表事件是1990年的罗马峰会，即欧洲理事会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作为主持人的意大利总理突然发起表决，要求对德洛尔计划第二阶段——货币联盟设置时间表，结果毫无疑问，只有撒切尔投下反对票。10月30日，撒切尔回到下院，就德洛尔的最终计划——欧洲议会成为民意代表机构（democratic body of the Community）、委员会成为执行机构和理事会成为参议院，作出了连续的、鲜明的否定：“No. No. No.”<sup>1</sup>这成为了撒切尔疑欧态度的最强硬表达，当然也成为了亲欧派愤怒失控的由来。

被激怒人中，最重要的应是杰弗里·豪，他在不久前还在采访中表达了对货币联盟的欢迎，甚至认为本国的hard ecu最终也会变成单一货币；<sup>2</sup>有观点因此认为，撒切尔的下院问答，让豪觉得首相正在关键议题上危害国家。<sup>3</sup>同时，亲欧派的诸多议员也会极端愤怒，他们已经失去内阁重臣，又认为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正在威胁自己的职位。<sup>4</sup>甚至连梅杰也大吃一惊，因为撒切尔同样否定了hard ecu的前景，这无疑让他的努力也大打折扣。<sup>5</sup>

这种愤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。杰弗里·豪在这次发言后，宣布将辞去职务，并于11月13日在下院发表了演说。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他与撒切尔在ERM、EMU以及hard ecu问题上的分歧，并对实质问题和撒切尔个人风格都做出了批评，甚至直言不讳，认为“从政府内部解决矛盾是不可能的”。<sup>6</sup>这场演说，无疑改变了诸多亲欧派的心境，他们不仅意识到，期待首相从之前的代价中吸取教训、改变政策，是不可能的事；还听到了首相最长期的盟友，对首相政策、思路和风格的曝光。同时，疑欧派同样怒不可遏，他们在豪的采访后就曾表示不满，<sup>7</sup>而在“No. No. No.”回答后热烈喝彩，态度同样十分鲜明、不可撼动。

至此，可得出的结论有：其一，疑欧派的调和完全失败，派系对立的条件依然存在，欧洲因素导致挑战发生仍然成立。其二，欧洲因素的程度已经进入失控状态，相比于1989年挑战，情况已经完全不同。如果说1989年挑战，还有诸多亲欧人士心怀希望，认为首相会从损失阁员中吸取教训；那么1990年的此刻，他们的希望必然全部破灭，指望对方派系的改变已不再可能。事实是，撒切尔不仅强化了疑欧政策，更导致了杰弗里·豪的辞职和决裂。同时，豪在演讲中的呼吁，无疑起到了凝聚本方力量的作用，使欧洲问题完全成为了主导喜好的标准。<sup>8</sup>既然“政府内部解决矛盾”不再可能，那么只有诉诸挑战一条路了。

<sup>1</sup>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42, pp. 145-146..

<sup>2</sup> John Major, *John Major: The Autobiography*, p176.

<sup>3</sup> Eric J. Evans, *Thatcher and Thatcherism*, p113.

<sup>4</sup> 有观点高度评价议员的作用，如 Tim Bale, *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: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*, p245.

<sup>5</sup> John Major, *John Major: The Autobiography*, p176.

<sup>6</sup> Sir Geoffrey Howe, “Personal Statement,” in House of Commons, *Hansard*, 13 Nov, 1990.

<https://api.parliament.uk/historic-hansard/commons/1990/nov/13/personal-statement>. 上网时间：2021-4-2.

<sup>7</sup> 这主要体现在“布鲁日小组”的态度上，参见 Alan Watkins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p145.

<sup>8</sup> Hugo Young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p369. 其与本文观点一致。

## （二）终点：第二次挑战及其成功（1990年）

行文至此，不妨比对1989年挑战的分析，对1990年挑战进行解释。在1989年，有影响力的“亲欧”阁员，可能不会阻拦、但也不会鼓励或教唆一场挑战；然而当下，他们当然会鼓励、背书，如果挑战发生，他们一定会全情投入。在1989年，这些“亲欧”派可能不会亲自下场参与挑战，然而当下，他们一定会有此念头，这其中最突出的、最重要的、影响力最大的，毫无疑问是曾经的阁员、曾任国防大臣的赫塞尔廷。

赫塞尔廷属于“亲欧”阵营自然是不争的事实<sup>1</sup>，但他走向挑战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他在回忆录中说，在1990年春季，他仍不断重复、强调他“无法预知任何一个他会挑战撒切尔的情境”，以回应撒切尔支持者对他发起挑战的猜测；<sup>2</sup>五月，在回答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提问时，他再次否认会挑战撒切尔；<sup>3</sup>而直到当年11月1日，即豪已经宣布辞职后，他才宣称，他不发起挑战的信念有所动摇；<sup>4</sup>而在聆听完豪的辞职演说后，他才在震惊（shock）之中，在众人的目光和内心的诘问下，最后决定发起对撒切尔的挑战。<sup>5</sup>

如果说梅耶作为挑战者，预示了1989年“亲欧”派的缺乏实力或能力，那么赫塞尔廷作为挑战者，毫无疑问显示了1990年“亲欧”派的坚定与一致。不妨继续延续上一章的思路，对此时投票的可能性作一分析：

### ①1989年投票支持撒切尔的议员：

（1）坚定的疑欧派：毫无疑问，他们会继续投票支持撒切尔夫夫人；

（2）温和的疑欧派：他们与约翰·梅杰所持观点应该相似，即更现实、更重视操作性的“疑欧”议员，他们可能会基于立场，继续投票支持撒切尔；也可能基于实际政治操作或党内团结，放弃投票；具体有多少坚定、有多少弃权，本文无法给出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挑战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会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之后的领袖，目的是既保留“疑欧”的政策取向，又同样保证可操作性和全党团结；（这一类显然不包括梅杰本人，他作为内阁重臣，既是撒切尔的提名人，也一定会投票给撒切尔，他本人在回忆录中便这么说，<sup>6</sup>本文也采信这一说法。）

<sup>1</sup> 他自己也直言不讳，参见 Michael Heseltine, *Life in the Jungle: My Autobiography*, p343.

<sup>2</sup> Ibid., p352.

<sup>3</sup> Ibid., p353.

<sup>4</sup> Ibid., p355.

<sup>5</sup> Ibid., p362.

<sup>6</sup> John Major, *John Major: The Autobiography*, pp. 183-184.当然，在具体的挑战声明中，他不仅提到了欧洲（见第一章），也提到了投票税，但这不能证明投票税是一个真实的原因。其一，正文所说，直到1990年11月他仍无心挑战，而投票税此时不仅存在，更已渡过了危机阶段，如果说因为投票税发起挑战，为何要持续做如此表态？其二，本文在第一章提出，并不是投票税本身很可怕，而是投票税带来的动荡、分裂很可怕，这让保守党议员普遍感到恐惧。作为政治人物，赫塞尔廷当然希望挑战能够成功，也当然就会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材料，投票税成为了恐惧的代名词，因此当然出现在了声明中，以唤起更多的撒切尔反对者。当然，赫塞尔廷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，可能真的认为投票税应是一大原因，但就本文的分析而言，客观上讲，投票税并不是原因之一，更不可能决定结果。

(3) 期望首相能吸取经验、有所改变的“亲欧”派：如前文所述，议会保守党、内阁两大层面，均已因欧洲因素而分为两派，即实现了派系分野，而罗森辞职，便是首相个人、也是内阁全体，为这种分裂付出的代价。不乏很多“亲欧”议员，认为撒切尔夫人会因这种代价而改变，因此在当时支持撒切尔；然而，1989-1990年的事实，让他们意识到撒切尔很难实质上做出调整，甚至还会激化矛盾，豪的辞职和演讲就是最大警醒，因此他们中绝大多数，在1990年应当会转而投票支持赫塞尔廷，这也是两次投票最大、最明显的变动所在，因此，粗糙地讲，撒切尔在两次挑战中票数的差，应该与赫塞尔廷和梅耶的票数差相差不远；

②1989年投票支持梅耶的议员：他们应当是最坚定、最顽固的“亲欧”派，前文所述，梅耶自己声称，他因为欧洲问题发起挑战，这也几乎是他唯一的政治口号。力量差距如此悬殊，支持撒切尔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，而在这种情况下，仍为梅耶投票的所有议员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便是基于极为“亲欧”的立场，他们在1990年显然会延续一贯立场，继续投票支持赫塞尔廷。（见表3）

表 3：欧洲因素如何决定 1990 年挑战的结果

欧洲因素如何决定 1990 年挑战的结果				
		1989 投给梅耶		1989 投给撒切尔
		坚定疑欧派	温和疑欧派	带有期待的亲欧派
投票支持撒切尔	几乎没有	绝大多数	一部分 (其余弃权)	几乎没有
投票支持赫塞尔廷	绝大多数	几乎没有	几乎没有	绝大多数
是否整体改变意向	否	否	较少	绝大多数

注：按前文，撒切尔减少的票数≈赫塞尔廷所得票数-梅耶所得票数。

资料来源：自制。

最后的投票结果<sup>1</sup>基本印证本文判断，撒切尔夫人的得票大幅减少了 110 票，而赫塞尔廷相比于梅耶，多得了 119 票，数字比较接近。同时，它揭示出，多数温和的“疑欧”派在投票中仍支持首相而非弃权，因此撒切尔夫人维持了多数。但随着大量亲欧人员的转投，她当然没能在一轮内终结比赛，挑战将进入第二轮，重新报名、提名和投票。
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本文不致力于中观研究，只根据选举机制计算、推演，而是坚持宏观原因角度分析的重要性，此处的计算只作大致验证之用。更关键的是，挑战进入第二轮前，即在两轮投票的间隔期内，撒切尔夫人被自己的中低级内阁成员施压，不得不退出挑战。这是中观研究所不能解释的，而本文却可以给出答案：前文所谓的温和“疑欧”派，其实大多

<sup>1</sup> 绪论中曾提及投票结果，复述如下：撒切尔 204 票，赫塞尔廷 152 票，弃权 16 票。

数就是内阁中低级成员，以及受这些成员影响的普通议员。低级阁员多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的提拔，多数人的“疑欧”立场比较可靠，<sup>1</sup>所以在投票中，他们理所当然投票支持撒切尔。然而他们同样不断接触政治实务，在投票之外，他们又不得不回到现实当中。撒切尔妥协失败、豪的演讲等等因素，也即欧洲因素，造成了党内的分裂和政治操作的困难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他们才施压撒切尔。这与撒切尔本人记述比较符合，在谈话中，他们纷纷承诺，在投票中已经、并将继续支持首相，但是却用大同小异的理由劝退撒切尔。<sup>2</sup>而可以推测，受他们影响的议员，也会采取相似的立场。这一现象是用“机制”的规定和琐细文字所无法解释的，<sup>3</sup>但却是欧洲因素发挥作用的真实证据。因此，撒切尔夫人的确是“从未败阵的首相”，但这只是一种宏观上毫无意义的胜利，当她让带着期待的“亲欧”派失望，又吓到了极具现实感的温和“疑欧”派之后，她其实就已站上悬崖的边缘。

一言以蔽之，欧洲因素造成的派系对立得以保留，这激发了第二次挑战；而指望首相改变策略的失意“亲欧”派，坚定地按立场投票，主导了投票的具体过程、轮数和票数结果；注重实务的温和“疑欧”派，促成了撒切尔最终下野。这便是“疑欧”、“亲欧”之争与撒切尔夫人的下野的具体关系。

---

<sup>1</sup> 这与前文提到的撒切尔出于团结不得不任命亲欧阁员并不矛盾，其一，这些任命是在已经损失亲欧阁员的前提下，做出的一些补偿；其二，即便任命也不会权力过重或数量过多，首相当然不会制约自己。

<sup>2</sup> 相关事实参见 Margaret Thatcher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pp. 850-855. 阁员纷纷表态，在投票中已经、并会继续支持撒切尔，但认为尽管自己投票支持，但撒切尔仍会输掉第二轮投票。

<sup>3</sup> 现有成果仅仅停留在政府成员出于尊严和荣誉，建议她主动退出，参见上一注释。这一说法是微观层次的，没有考虑深层动因。相似的说法是，大臣们认为赫塞尔廷会赢，但决不想成为他的阁员，因此阻止，而为什么不希望赫塞尔廷赢，这基本符合正文观点。至于经济主张，根据赫塞尔廷在梅杰政府的表现，应该是不成立的，参见 Tim Bale, *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: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*, p285, p248.

## 结语

本文探讨了“亲欧”、“疑欧”在撒切尔时代后期的影响：自1986年以来，对欧态度分歧造成了派系的对立，而由于处理不当，对立得以持续存在，分别导致了两次挑战。其二，两派的对立不断积累，虽然第一次仍有改变、期待余地，但第二次却难以调和，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最后结果，通过“挑战”、劝说的方式，造成了撒切尔夫人的下野。

然而，撒切尔夫人虽然离去，但仍遗留下许多问题，其中最重要的是，新首相是否成功化解了派系对立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后来欧洲问题没有再引发挑战？这涉及两大层面。其一是挑战机制的变迁，1997年之后，发起挑战的规定有所调整，同时投票权也逐渐扩大，并沿用至今。这一转变是否与欧洲问题有关？又何如塑造了之后的欧洲问题斗争？这是本研究自然的逻辑延伸。其二是欧洲因素自身的演变。从事实角度而言，经济问题在撒切尔之后已不成为问题，就连作为对手的工党布莱尔（Tony Blair）政府，也承袭了她的经济政策，这证明关于经济已达成共识，无需再争论。那么是否有可能，欧洲问题继承了之前经济问题的地位，成为了大选中竞争最激烈的问题？欧洲问题在人事变更中的“大选决定论”，是否适用于1990年之后的保守党党魁人选？这当然是另一个相关的重要议题。

除此之外，撒切尔因经济问题上台，这使得研究者们更多关注“撒切尔主义”（Thatcherism）的经济层面，至多涉及社会、伦理等内容；然而被忽视的是，她的突然下台却是因为一个全新升级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新问题，即欧洲问题。那么这一思路是否可以用于观察类似的领导人？如罗伯特·皮尔（Robert Peel）、阿斯奎斯（Herbert Asquith）或其他著名首相，是否也可以借用本文的框架予以解释？这当然是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，需要深入研究。

撒切尔的离去同样是分析今日英国的一把钥匙。有观点便认为，今日的疑欧思潮起源于撒切尔。<sup>1</sup>那么亲欧派与疑欧派的斗争，在脱欧之后如何定位？又将如何影响英国对外政策？它与“全球英国”（Global Britain）政策会如何互动？<sup>2</sup>这些问题尚不明确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英国的对欧态度，仍将深刻影响双方的合作与纷争，撒切尔下野的探源，在分析解决此类政策问题时，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意义。

<sup>1</sup> Cary Fontana and Craig Parsons, “‘One Woman’s Prejudice’: Did Margaret Thatcher Cause Britain’s Anti-Europeanism?” p89.

<sup>2</sup> 此政策为英国最新对外战略，具体做法参见 HM Government, *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: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, Defence,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*, London, March 2021, pp. 14-16. <https://www.gov.uk/government/publications/global-britain-in-a-competitive-age-the-integrated-review-of-security-defence-development-and-foreign-policy>. 上网时间：2021-3-26.

<sup>3</sup> 比尔·考克瑟等：《当代英国政治（第四版）》，第448页。其表达的观点与本文类似。



## 参考文献

中文著作：

比尔·考克瑟、林顿·罗宾斯、罗伯特·里奇：《当代英国政治（第四版）》，孔新峰、蒋鲲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。

谢峰：《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：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。

英文著作：

Bale, Tim, *The Conservative Party: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*, Cambridge & Malden: Polity Press, 2010.

Bale, Tim, *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: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*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2.

Crowson, N. J. *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: At the Heart of Europe?* London & NY: Routledge, 2007.

Evans, Eric J. *Thatcher and Thatcherism*, London & NY: Routledge, 1997.

Forster, Anthony, *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: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*, London & NY: Routledge, 2002.

Gamble, Andrew, "Europe and America," in Jackson, Ben and Saunders, Robert, et al., *Making Thatcher's Britain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2.

Green, E. H. H. *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: Conservative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*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2.

Heppell, Timothy, *Choosing the Tory Leader: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*, London & NY: Tauris Academic Studies, 2008.

Heseltine, Michael, *Life in the Jungle: My Autobiography*, London: Hodder & Stoughton, 2000.

Major, John, *John Major: The Autobiography*, NY: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, 1999.

Thatcher, Margaret, *The Downing Street Years*, London: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, 1993.

Watkins, Alan, *A Conservative Coup: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*, London: Gerald Duckworth, 1991.

Young, Hugo, *This Blessed Plot: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*, London: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., 1998.

英文期刊文章:

Cowley, P. and Garry, J. "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: The Choosing of John Major," *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*, Vol. 28, No. 3, 1998, pp. 473-499.

Daddow, Oliver, "Margaret Thatcher, Tony Blair and the Eurosceptic Tradition in Britain," *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*, Vol. 15, 2013, pp. 210-227.

Denham, Andrew, "From Ted to Ed: Electing British Party Leaders," *The Political Quarterly*, Vol. 83, No. 3, 2012, pp. 576-584.

Fontana, C. and Parsons, C. " 'One Woman's Prejudice': Did Margaret Thatcher Cause Britain's Anti-Europeanism?" *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ervice*, Vol. 53, No. 1, 2015, pp. 89-105.

Jesse, Neal G. "Thatcher's Rise and Fall: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ory Leadership Selection Process," *Electoral Studies*, Vol. 15, No. 2, 1996, pp. 183-202.

Norton, Philip, "Choosing A Leader: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-1990," *Parliamentary Affairs*, Vol. 43, No. 3, 1990, pp. 249-259.

网络资料:

Conservative Party, *1987 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: The Next Moves Forward*, 1987. <http://www.conservativemanifesto.com/1987/1987-conservative-manifesto.shtml>.

上网时间: 2021-5-27.

HM Government, *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: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, Defence,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*, London, March 2021, pp. 14-16. <https://www.gov.uk/government/publications/global-britain-in-a-competitive-age-the-integrated-review-of-security-defence-development-and-foreign-policy>. 上网时间: 2021-3-26.

Howe, Sir Geoffrey, "Personal Statement," in House of Commons, *Hansard*, 13 Nov, 1990. <https://api.parliament.uk/historic-hansard/commons/1990/nov/13/personal-statement>. 上网时间: 2021-4-2.

Thatcher, Margaret, "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," 20 September, 1988. <https://www.margaretthatcher.org/document/107332>. 上网时间: 2021-3-9.

## 致 谢

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终于告一段落，这项工作自2020年10月开始，自2021年5月终止，历经确定领域、阅读材料、草拟题目、动笔写作、修改定稿多个阶段，可以说贯穿了大四一整学年，是这一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我仍能回忆起秋季学期每周一下午，在院图书馆值班时阅读英文材料；也可以想到春季学期，黄沙漫天的季节里坐在电脑前写作；当然，在突然到来的暑热中反复修改、敲打细节，更是新近发生，记忆深刻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项工作都已结束，不敢说水平多高超、内容多新颖、理论多完善，但至少我将它当成了一项重要任务，投入了大量精力，至少可以说问心无愧，也可以是北大本科生涯的一个句点了。

在这过程中，当然要首先感谢指导老师梅然老师。与梅老师初识于大二春季的英国课程，大三一年虽联系不多，但又在大四秋季继续修习老师开设的选修课。其间问的问题不少，有质量的不多，不敢说让老师印象深刻，但总归让老师记住了这张面孔；也承蒙先生不弃，愿意接纳我作为研究生指导对象。就这篇文章而言，从领域、材料，再到定题、修改，老师无一不参与其中，其悉心教导、耳提面命，让人如坐春风、醍醐灌顶。无论是初稿形成后，不厌其烦耗费一整下午时间指导；还是修改稿出炉后，连注释中首字母没有大写都能发现的细致入微、尽心尽责，都让人肃然起敬。我自知无论是论文，还是更广泛的学业，都有太多不足之处，但也终能忝列门墙，在研究生两年时光中继续跟随老师学习探索。

当然，父母的支持更是我学习的基础与支柱。不敢言所学甚多、所知甚广，但若非要举出一件本科期间学到的道理，那便是重视、珍惜我们的家庭。这不仅塑造了我，也改变了家中的每一个人，也正是这一个一个小家，构筑起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，成为伦理、道德和信仰的发祥地，成为常识、经验和正义的避难所。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变化，其中一些饶有趣味，但大多数荒谬至极。总有人喜欢把放纵、无道、败坏说成进步或自由，乐意将美德、传统、历史称为黑暗和负担，结出恶果还懵然无知，助纣为虐还自以为是。当然，我也只是普通人，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家庭，虽然会揶揄国际大事、妄言天下之道，但归根结底也只是儿子、亲人、朋友、同学。因此，家庭的光亮再一次凸显，每当想起与父亲煮酒论英雄，与母亲饭后百步走，或想到以后我可能组建的家庭、拥有的生活，我还是会感觉到温暖、安心。纵然发生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、遭遇了代价最为惨重的失败，但历史不会终结。即便终结，那也不该是人类考虑的事；即便终结，我们也无法预知；即便终结，我们也至少在世间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地体验了一回，有父母亲人、有知己好友、有天下同胞，他们留给我的记忆与启迪，超越了四年本科时光，成为了永久的人生印记。

这便足矣。

2021年5月22日雨夜 于燕园

#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诚信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

## 诚信声明

本人郑重声明：所提交的学位论文，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，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。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，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。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，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。本人尊重并一贯遵循北京大学及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风、品格，在论文写作中严格遵循诚信原则。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。

本人借助北京大学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，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及相关检索功能，检查得出如下结果：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为 8.1%，符合学校及学院查重规定和相关学术惯例。特此说明。

论文作者签名：宋仪萱

日期：2021 年 5 月 28 日

##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

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、保存、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，即：

-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；
- 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，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，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；
-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、缩印、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；

论文作者签名：宋仪萱 导师签名：梅

日期：2021 年 5 月 28 日